学术思想

“侨居地汉学”与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之发展
——以《中国评论》为中心的讨论

王国强

[摘要]《中国评论》是晚清时期一份出版于香港的英文期刊。这份刊物汇集了其时西方汉学界尤其是在华西人研究中国的主要成果，是最早的在中国出版的专业汉学刊物之一。该刊不仅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在研究方法、资料发掘和领域扩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突破，从而推动了英国汉学在“域外”尤其是以香港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见证了英国汉学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整体崛起。

[关键词] 中国评论　英国　汉学　香港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07) -04-0051-12

“Resident Si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Sinolog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Published in Hong Kong from 1872 to 1901,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East, was an English language periodical that gathered together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Sinology in that time. This was the earliest Western journal wholly devoted to Chinese Studies. China Review not only displayed a high level of scholarly awareness, it also represented a breakthrough in research methodology, unearthing of source materials, and expansion of Sinological studies. China Review advanced overseas British Sinological studies, especially developing Hong Kong as representative, witnessed the entir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Sinolog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等国家相比，英国人对中国的研究起步较晚。“十七和十八世纪英国的中国研究可称之为前汉学阶段，那个时期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还是人文主义的，不属于文献学和实际意义上的汉学研究。”①不过，到了十九世纪，随着中英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英国对中国的这种人文主义的兴趣起了新的变化。尤其是来华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由于职业的需要开始对中国进行专门的研究，他们“在撰写宗教著述、商务指南、蓝皮书和海关报告的闲暇时间里编辑字典、翻译中国文献，从而使汉学从文学中脱离出来。”②

但学者对十九世纪英国汉学的评价却颇为不一。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这个时期的英国汉学远远落后于法、德等国家。如英国学者巴雷特（T. H. Barrett）在其所著《出奇的冷漠》③一书中“继承了二十年前崔瑞德教授的观点，对英国的中国学作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他从十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国学开始，将荷兰、法国、德国、俄国及北欧、美国也纳入视野加以比较，考察各个时代对中国书的收集和中国研究的状况，结论是，在全世界中国学的范围内，英国并没有做出应有的成绩。”④第二种看

[收稿日期] 2006-6-10

[作者简介] 王国强（1978—），男，洛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洛阳 471022

法与此针锋相对。如阙维民先生指出“从十六世纪至1924年，西方汉学家共有7737位，其中113位至少发表或出版了20篇（部）以上的论文（著作）。笔者称他们为多产西方汉学家，其中英国为37人，法国29人，德国12人，美国9人，其他国家7人，不明国籍者19人。而在37位英国高产汉学家中，仅有两位逝世在1850年之前，6位逝世于1925年之后，他们在华期间和汉学研究最佳年龄阶段在十九世纪的占大多数。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说明，十九世纪的英国汉学研究队伍，已经成为左右西方汉学研究的主导力量之一。”⑤

笔者以为，上述关于英国汉学的评价出现巨大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考察的地理范围不同。“批评派”大都是仅仅考察了英国“本土”汉学的基本情况，没有充分重视英国汉学在“域外”的发展。在本文中，作者提出了一个“侨居地汉学”的概念，以此来概称英国汉学在其“本土”之外的发展。并试着以《中国评论》这份在十九世纪末刊行的期刊为例来说明英国“侨居地汉学”的发展状况，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本时期的英国汉学做出评价。

一、《中国评论》简介

《中国评论》（原刊名为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是晚清时期一份出版于香港的英文期刊。对于《中国评论》的专门研究，目前为止还十分有限。就笔者所见，仅有香港浸会大学黄文江先生Hong Kong and Sino - 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 Ernest John Eitel and the China Review⑥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黄先生重点论述了E. J Eitel（一般译为艾德或欧德理）与《中国评论》的关系，对该刊的基本情况也有大致介绍。但由于缺乏较为直接的档案材料，全面而准确地认识这一刊物还存在不少障碍。这里笔者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所得，考述该刊的几个基本史实并论证其对于英国汉学发展的贡献。

就笔者所知，目前相关论述关于《中国评论》的略称和译名颇为不一，大致如表一所示。

表一：相关著述对 China Review 的略称和译名一览

略称	中译名	出处	出版时间
China Rev *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1902 - 24
	中国评论	贝德士：《西方东方学报论文举要》	1933
Ch. Rev.		石田干之助：《欧米に於ける支那の研究》	1943
CRNQ		Martha Davidson: A List of Published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1952
CR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	1975
	中国评论	贾静涛：《中国古代法医学史》	1984
	中国杂志	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 交广印度两道考》（中译本）	2003
CRNQ	中国书评	陈才智：《西文汉学研究期刊一览》#	2006

* 或Chin. Review，原书写法不统一

\#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Article.asp? ID = 1498，2006年1月15日。

总而论之，以CRNQ作为英文略称较为合适，因为它避免了该刊与其他以“China Review”命名的刊物之间的混淆，具有独一无二性；而以《中国评论》作为中译名较为常见，其余“杂志”和“书评”的译法均与该刊的内容和精神不符。笔者在本文中所采用的也是这两个标准。

笔者所见关于《中国评论》的相关论述中，错漏之处颇多。以下笔者就其“前身”、出版的地点和时间、编辑、作者群、发行渠道、栏目设置和主要内容等方面来逐一探讨，顺带指出相关著述的不确之处。

1.《中国评论》的前身。在《中国评论》的开篇“导言”中，编者指出“要了解《中

国评论》出版的目标，就必须注意到人们对有关中国和远东这个知识宝库的兴趣不断增长的愿望。《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一份在中国和欧洲都颇受欢迎的刊物在出版四年后不幸停刊了。原因就在于前任主编因工作关系返回欧洲，而其继任者出于未知的原因而未能继续。《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另一份目标相近但更多地关注传教士读者的刊物，也停刊了，它的复刊看起来也成了一个未决的问题。"[7] "在有些方面它可以说是上述两份刊物杂志的继承者"[8]。虽然《中国评论》的编辑同时以《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继承者自居，认为"《中国评论》是《中国丛报》这份曾经著名而至今仍赞誉颇多的刊物的合格继承者"[9]，并在开篇"导言"中宣称要"在版面允许的情况下重印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优秀文章"。[10]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中国评论》对于《中国丛报》，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而已，通观《中国评论》全卷，根本没有重印一篇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文章。

而《教务杂志》明显的是一份宗教性的刊物，与《中国评论》作为专业汉学刊物的性质相差甚远，并且《教务杂志》于 1874 年在上海复刊并一直发行到 1941 年方告结束。

倒是《中日释疑》和《中国评论》，无论在内容、形式和人事方面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国评论》真正"前身"。两者的承继关系可由下列情况看出：它们的创始人都是丹尼斯（N. B Dennys）；这两份刊物都与《德臣报》（China Mail）关系密切；作者群也大体相同[11]；从杂志的形式来看，《中国评论》继承了前者"释疑（Notes and Queries）"的基本形式，只不过增加了长篇的论文和"学界消息"（Notes of New Books and Literary Intelligence）两个栏目而已；在内容上，两者都以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为主要的探讨对象，并兼及日本和朝鲜。

2. 《中国评论》的出版地点和时间。石田干之助在《欧人之汉学研究》中明确指出："《中国评论》，《支那民俗志》（Fork – lore of China and It ' s Affinities with that of the Aryan and Semitic Races 1876）一书的作者丹尼斯氏一八七二年七月在香港创刊的隔月发行的通俗学术刊物，由氏所经营的《德臣报》（China Mail）社发行。后由所谓《梵汉字典》（Hand – 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being a Sanskrit –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ms, 2nd , 1888）的作者艾德（Rev. Johann Eitel）任编辑。至一九零一年六——七月号（第二十五卷第六号）刊出后遂停刊。"[12]

关于《中国评论》的出版地点和时间，一直存在着不少误解。上述这段话传达出的错误信息却是《中国评论》是属于上海的刊物[13]。受其影响，《上海市出版志》一书中的"大事记" 1867 年条下载"创刊《远东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英文季刊，伟烈亚力等主持。1872 年改名 China Review 双月刊，1920 年改名 The New China Review ……"。[14]实际上，《中国评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由香港的"德臣报印字馆"、伦敦的"Trübner & Co. "和"别发洋行"共同出版发行的，而别发洋行的总部位于上海，在香港等地设分部[15]，所以可以推测该刊在香港出版的时候，可能也同时在上海、伦敦和新加坡等地发行。但绝不能据此而认为《中国评论》是上海的刊物。

《中国评论》的创刊时间基本没有异议，为 1872 年。而对于其终刊时间，却至少有三种说法：1901 年说、1903 年说以及至今仍在出版之说。终刊时间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评论》似乎没有"停刊告示"，缺乏直接材料，而各家所据的间接文献又互有出入。而据笔者所见，可以大略推知第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史实。作为汉学研究权威杂志的《通报》，在 1902 年刊登了《中国评论》停刊的消息。大意如下：我们得知由别发洋行出版的刊物《中国评论》，于 1901 年刊出二十五卷第六期（6 – 7 月号）之后，暂告停刊[16]。另外，贝德士（M. S Bates）在其所编著的《西方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一书中也指出《中国评论》"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三年在香港创刊，刊至二十五卷（一九零零至一九零一年）即停歇。"[17]再如上述石田干之助一书[18]和库寿龄（S. Couling）的《中国百科》[19]均持这一观点。

其他说法则不大可靠。如黄文江先生在 Hong Kong and Sino - 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 Ernest John Eitel and the China Review 一文中依据 1903 年香港蓝皮书的统计，认为“中国评论的出版时间始于 1872 年，终于 1903 年。”[20]黄先生的这个论断目前来看不能成立，因为没有其他旁证，在明显与上述其他相关材料矛盾的情况之下，只能使人怀疑香港蓝皮书记载的准确性。至于最后一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但却时常在国内的相关论著中见到。如《国外汉学史》一书就称“中国评论，香港出版，双月刊。自 1876 年创刊后一直在刊行。”[21]张弘的《中国文学在英国》[22]和陈才智先生所整理的《西文汉学研究期刊一览》[23]亦持此说。这一错误判断其实有点可笑，是沿袭依据翟理思（H. A Giles）《中国文学史》的说法而来的。翟氏的《中国文学史》初版于 1901，而完稿之时自然要稍早些，也许还在 1900 年底，所以《中国评论》在 1900 年就刊登了下列消息：“翟理思教授告诉我们他关于中国文学历史的作品，作为 Goses 所编辑的丛书中的一种，出版的相关事宜即将完成。”[24]也因此翟理思在其书后的 Bibliographical Note 中说《中国评论》“至今仍在出版”[25]是十分自然的。如果说《国外汉学史》和《中国文学在英国》因为重述翟理思原书的说法而没有加以说明，从而容易使人误解，那么陈才智先生的说法就只能说是错误了。第三种终刊说法之所以产生的一个客观原因，可能在于以 China Review 命名的刊物过多，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地区时常出现，如至今香港还出版有名为 China Review[26]的杂志，所以如果不细加探询的话，极易将这些刊物混为一谈，因而得出本文所谈的《中国评论》始终未曾停刊，至今仍在发行的错误说法。

还有一个问题，若《中国评论》为始于 1872 年而终于 1901 年的双月刊，那么该刊的总数应为 29 卷 174 期，而高第（H. Cordier）和石田干之助都说仅有 25 卷，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评论》(又称《远东释疑报》)，1872 年在香港创刊，1901 年终刊，共出 25 卷 143 期，为英美在华传教士兼汉学家的汉学评论刊物。”[27]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何在呢？实际上，《中国评论》从 1872 年 7 月创刊，至 1890 年 5 月这近 18 年间，出版时间较为规律，每年 1 卷，每卷 6 期，共计 18 卷 104 期刊。从 1890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评论》的出版情况出现了一个“波动期”，该刊第 19 卷延后至 1892 年 1 月才出版了最后一期。据其 1892 年 1 月份的告示所言“《中国评论》上一卷的最后 3 期由于各种原因而推迟了出版的时间。这一期出齐了 19 卷，我们决定在今年（1892 年）出版下一卷（20 卷），这样可以避免以前每卷的始终两期都在年中的不便。我们将尽力在本年出齐全卷的 6 期。”[28]编辑的愿望并未实现，其后几年变成了每两年出一卷。依次为：20 卷：1892 - 1893；21 卷：1893 - 1894；22 卷：1895 - 1896；23 卷 1897 - 1898。最后两卷重又恢复到创刊初期的发行模式，1899 年下半年至 1900 年上半年出版 24 卷，1900 年下半年开始出 25 卷，至翌年 6 月出版此卷第 6 期后终刊。所以总计 25 卷，每卷 6 期，合为 150 期。

3.《中国评论》的编辑总共有几位？在职时间为多久？这两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困惑了笔者相当长的时间，就是到了现在，仍然不能说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从前引石田干之助《欧人之汉学研究》一书来看，《中国评论》有两位主编：丹尼斯和艾德。库寿龄的《中国百科》也称该刊在“1872 年由丹尼斯创刊于香港”，“第二任主编是艾德博士”[29]，与前说保持一致。

1872 年《中国评论》在香港创刊时，作为创始人的丹尼斯成了该刊的第一位主编，翻开该刊第 1 卷第 1 期的扉页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样：“主编丹尼斯，皇家亚洲文会会员、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员”。丹尼斯任主编的时间大概止于 1876 年 7 月第 4 卷出版完毕时，具体原因尚不大清楚。但从丹尼斯本人的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在“1860 年代和 1870 年代担任《德臣报》和《中国评论》的编辑的同时，还是香港市政厅博物馆和图书馆创立人。1877 年，丹尼斯作为华侨‘助理保护官’而前往新加坡。”[30]可能是繁杂的其他事务结束了他作为《中国评论》主编的这一角色。

关于艾德担任《中国评论》主编的问题，黄文江先生认为“艾德是否直接接替了丹尼斯的编辑职位仍然不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1878年艾德已经成为《中国评论》的主编。”[31]其实艾德担任《中国评论》主编的时间还是比较确定的，因为该刊第五卷（1876年7月-1877年6月）的扉页上第一次出现了“主编：艾德，图宾根大学博士”的字样。联系到丹尼斯的情况，应该可以比较肯定地说，艾德是直接接替前者担任主编一职的。

至此为止，《中国评论》主编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高第、库寿龄和石田干之助等诸家之说几乎完全一致。但艾德1897年就从香港政府退休，和他的妻子及四个孩子定居于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并在阿德莱德大学开设德国语言和文学的课程，[32]根本不可能再担任《中国评论》的编辑。《中国评论》22卷第4期的一篇名为“编辑声明”的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该文称“在本期的序文中表达对前任主编的感激之情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他已经离开了编辑的位置并不再远东地区居住了”，而“这份《评论》的任何优点都离不开他的辛劳和认真”。[33]可以肯定，《中国评论》的主编至少应为三位，谁又是艾德的继任者呢？笔者目前还没有发现较为直接的资料。

另据《欧洲中国学》一书的说法，波乃耶（Ball, James Dyer）在“1900-1901年曾担任《中国评论》（英文刊名为The China Review）杂志的主笔。”[34]原书此处没有注释，不知所据为何？笔者在这里也只能存而不论。

4.《中国评论》的作者群。《中国评论》的作者主要是在华的外侨，包括传教士、外交官、海关职员和香港政府的公务员等，当然也包括少数欧洲本土的汉学家如德国的嘎伯冷兹（Gabelentz）和香港的华人如何启（Ho Kai）博士。其中较为活跃的包括“翻译中国经书的著名英国学者理雅各（J. Legge），在广东设立‘嘉约翰精神病收容所’的美国籍传教士嘉约翰（J. G. Kerr），南洋史研究的开拓者、英国驻华领事费笠士（G. Phillips），上述的俄国人贝勒（E. Bretschneider），英国的庄延龄（E. H. Parker），德国的艾德（E. J. Eitel）等，都是毕生从事中国研究的笃学之士。”[35]

在所知的125位作者中，国籍可考者有119人。分布如下：英国74人、美国18人、德国14人、法国3人、奥匈帝国2人、荷兰2人、瑞士2人、葡萄牙1人、丹麦1人、俄国1人、中国人1人，可见英国人占据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从职业来看，可考者113人，计有传教士36人、外交官3 4人、海关人员20人、学者9人、香港殖民政府人员8人、商人4人、医师3人，其余有银行职员和编辑以及记者各1人。但必须指出的是，该刊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一身兼多任的人物。如第一任主编丹尼斯，就有外交官、编辑和港府职员三重身份；而第二任主编艾德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既是传教士和学者，同时又任职于香港殖民政府。笔者所采用的标准大致如下：每个人的身份只认定一种，那就是他本人在给《中国评论》投稿的那段时间里的最主要的身份，按照这个标准，笔者将丹尼斯的职业定位编辑，将理雅各的职业定为学者。

5.《中国评论》的发行渠道和地理范围。《中国评论》的发行渠道还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说明，只能依靠其他方面的线索来略加推测。第一个可资利用的是《中日释疑》的发行网络。《中日释疑》在不少地方设有代办处，“订阅者可以采用付费或者免费交流的方式”[36]获得该刊，具体地点包括：中国的汕头、厦门、福州、上海，东南亚地区的马尼拉，还包括澳大利亚、日本、伦敦和旧金山等国家和地区。[37]考虑到《中日释疑》和《中国评论》的密切关系，且两者间断的时间仅有一年半，所以可以推想后者也沿用了前者的发行渠道。第二个可以凭借的是“别发洋行”。李欧梵先生曾经指出，诚如别发洋行的“分支机构所显示的，他们的书籍运送线把下列城市紧紧地联系了起来：上海、香港、天津、横滨、新加坡、新德里和孟买。虽说这条运送线路很明显带著英殖民主义的印迹，这条城市链还是形成了一个国际文化空间，其中不仅英法的地位显赫，日本也扮演著重要角色。”[38]别发洋行一直是《中国评论》出版发行的机构之一。可以推想该刊的发行也利用了这条国际色彩极浓的

“运输线”。综而论之,《中国评论》的发行范围应该包括中国沿海的港口城市、东南亚地区、欧洲和新兴的英语世界——美国和澳大利亚。

6. 栏目设置和主要内容。该刊的主要篇幅是由专文组成的，包括论文、书评和翻译三大类。在《中国评论》几乎每一期都有的 To Contributors 中，编辑声明“《中国评论》欢迎关于中国及其相关领域的稿件，所涉主题如下：1、建筑（古代和近代)；2、土著民族；3、农、工、商业；4、考古；5、艺术和科学；6、传记；7、研究书目；8、中亚民族、地理和历史；9、年代学；10、朝鲜的历史、语言、文学和政治；11、工程著作；12、人种学；13、动、植物；14、地理、自然和政治；15、地质；16、行会和商会；17、历史（通论和区域史)；18、碑刻；19 中外关系；20、中国和日本在文学、宗教、哲学和文明方面的影响；21、法律；22 文学（古代和近代)；23 风俗礼节和体育休闲；24、神话；25、医学；26、冶金和矿物；27、钱币；28、政治机构及其治理；29 宗教信仰和礼仪；30、对有关东方著作的评论；31、秘密会社；32、商道；33、原住民族的著作、小说和戏剧等等。”这个略显冗长和杂乱的启示几乎无所不包，表明了编辑的雄心。

此外该刊还设有“学界消息”（Notes of New Books and Literary Intelligence）栏目，主要是报道汉学界新近出版的论著和发表的文章，“这些著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书，而是指最近两个月内出版的书”[39]。

最后一个栏目是继承自《中日释疑》的“释疑”（Notes and Queries)，即通过提问和回答的方式来了解中国的事物。

按照创始人的设想,《中国评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包括“中国、日本、蒙古、西藏、东方列岛和一般意义上的远东地区的科艺、人种、神话、地理、历史、文学、自然史、宗教等方面。”[40]不过通观整个期刊，中国以外地区的研究只有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并且数量十分有限。这份刊物所发表的论文和杂纂，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和历史。

二、作为“侨居地汉学”代表刊物的《中国评论》

按照一般的理解，“汉学”应该发生在其所属国家的“本土”，也就是说法国汉学应该是在法国，日本汉学应在日本，而俄国汉学是在俄国，美国汉学应在美国。纵使退一步来讲，某一时期特定国家汉学研究的重大事件和研究“重心”应该在其“本土”。

但历史本身却比这种简单的推理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这段时间内，由于殖民扩张等原因，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汉学研究在地理上分裂成了不同的部分：“本土”有汉学研究，在中国也有此类活动；甚至在“本土”和中国之外还有“第三方”汉学（如英国在东南亚和法国在越南的汉学研究)，而英国在这方面尤为典型。与“本土”的汉学研究相比，后两种类型的汉学研究者有更接近或直接生活在中国的便利条件，故而在研究的内容、材料甚至方法上均与“本土”的汉学研究有所不同；并且这些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由那些远离“本土”，因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从事传教、外交和商贸等活动而暂时或长期侨居在远东或者中国的西方侨民来完成的。鉴于此，我们把后两种汉学形态统称为“侨居地汉学”。这是西方汉学研究在中国和中国周边地区的扩散、延伸和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更多的西方人得以在中国居住或旅行，从事传教、外交、商业和科学考察等活动。他们中的一些好学之士在工作之余，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从事汉学研究，为“侨居地汉学”增添了大量的“生力军”。另外，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的语言学等学科的新理论和方法也被带到了作为“新世界”的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这些新的学术成果也为“侨居地汉学”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主要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推动，“侨居地汉学”在十九世纪的中后期获得了较为迅猛的发展，这在中国的沿海口岸和一些开埠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评论》可谓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侨

居地汉学”的代表性刊物。从其基本的情况来看：该刊发行于1872至1901年之间，共计29年；其出版地是香港；其可考的也是最主要的三位编辑也都是在华或中国周边地区从事传教和外交等事务的西方侨民；从作者群来看，可考的作者中仅有一位是中国人，少数是在欧洲的汉学家，其余绝大部分均为在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等。另一方面，从《中国评论》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该刊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引入了西方刚刚发展起来的语言学、民俗学等等学科的基本方法，做了不少类似于“田野工作”的资料收集活动（下文将有进一步的说明）。

《中国评论》能够成为十九世纪后半期“侨居地汉学”的代表性刊物，与该刊所具有的学术自觉性也有一定的关系。《中国评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学术自觉，即开始批判汉学研究的状况并思考关于汉学的一般问题。也正是由于这种自觉性，使《中国评论》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不依附于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而是对所有关注汉学研究的学者和普通读者开放。所以说《中国评论》在西方人认识和研究中国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其时居住在远东地区的西方侨民来说更是如此。在《中国评论》创刊的初期，《字林西报》就对《中国评论》在汉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其开放的姿态颇为称道。该报评论道：“《中国评论》在远东地区填补了一个空白，该刊为那些希望深入了解中国的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使他们可以超越那些来自官方日常记载的传统领域。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评论在研究这些领域方面的不断进步，并且它没有沦为某个政党或者阶层的‘机关报’。”[41]

美国学者韩大伟（D. B. Honey）曾经从文献学的角度将西方古典汉学史分为三个阶段：“耶稣会士阶段”、“法国汉学学派时期”和“英美学派时期”。考虑到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我们仅仅关注韩大伟所谈到的后两个阶段。法国汉学学派的代表包括了雷慕沙（A. Rémusat）和儒莲（S. Julien）等在内的著名学者，他们“首次发展了一套复杂的技术方法，不仅用于通过阅读使用文献，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文本传统之中批判地评估文献的价值及地位，并且大胆地提出独自的解释。”不过，这派学者“很少来自于中国注释传统的借鉴”，并“受制于欧洲图书馆有限的原始资料”。他们中的佼佼者为儒莲，“他不仅从未到过中国”，还以“从未利用过中文原文资料而自傲”[42]。

与自己的汉学前辈相比，以《中国评论》等刊物为代表的“侨居地汉学”的确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主要是得益于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特殊经历，身处中国的优势使他们不仅在语言学习上，在对中国的理解上，还在资料搜求和研究领域上实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突破。“侨居地汉学”的研究者不仅可以广泛地利用中国浩如烟海的各类文献，还可以搜求到诸如碑刻、地方志、征信录等这些在欧洲大陆的图书馆中难以见到的资料。再加上有了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这些汉学研究者还注重收集各种口头传说和口碑资料，试图在与其研究对象的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的过程中获取有益于研究的信息，他们还致力于各地方音的记录、研究和比较。所有这些都是困居于书斋的“法国学派”学者所难以想象的。

“侨居地汉学”诸方面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展开，与西方人文学科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方面与基督教传统也有一定的关联，如嘉约翰对广东慈善组织的研究。但似乎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侨居地汉学的特质，这些学科的绝大部分都需要类似于“田野工作”的资料收集过程。如果没有远东地区逐渐融入西方条约体系的大背景和其时西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没有这些研究者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特殊经历，这些研究就不可能完成。

《中国评论》作为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尤其是作为十九世纪后半期远东地区最为纯粹的汉学期刊，集中地体现和代表了“侨居地汉学”的上述种种特质。

其实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汉学界，对“侨居地汉学”在远东等地区的发展还是颇为了解的，不乏“先知先觉者”。如“晚年时的于连（Stanislas Julien）看到了中国在逐步对外

开放；港口的领事，内地的英法传教士开始与西方恢复中断了半个世纪的联系。当这位法国学者去世时，莱格（Legge）刚刚在香港出版了他的《中国古典作品》（1861－1862），这部著作指明了新形势可能为汉学家提供的研究资料。”[43]某些身处欧洲的学者也体会到了汉学研究的这种转变及其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如1870年在伦敦发刊的《凤凰》（phoenix）杂志就指出了居住在远东的汉学家在该领域的重要地位：“我们的职责是收集各种可靠的资料，并吸收来自居住在远东的杰出汉学家的稿件。他们的论著多能够切中肯綮，‘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的位置使得其能够轻易完成在欧洲的学者绞尽脑汁也未必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和我们携手，相信会为本刊增色不少。”[44]这两个例子说明当时的学者对“侨居地汉学”在远东等地区的发展不仅有所关注，甚至还寄予了厚望。

对于以《中国评论》为代表的“侨居地汉学”在远东地区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早在《中国评论》刊行的时代也已经有了“定论”，只不过叙述的方式较为间接和委婉罢了。1886年1月，《字林西报》的评论在提及新近成立的“北京东方学会”（Peking Oriental Society）时说：“很多年以来，北京都颇受汉学界的关注，因为在这里生活着很多学问高深却深居简出的汉学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北京能被称为是汉学界的代表吗？不久之前，学者们寻求在北京创办一份杂志，按照他们的设想，这份新杂志应该成为北方汉学界的代表性刊物，就像《中国评论》在南方的地位那样。但由于缺乏印刷出版机构和训练有素的编辑人员，这个计划没有实现。”[45]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十九世纪的80年代，《中国评论》作为“侨居地汉学”研究的有影响的刊物，其地位是相当显赫的。

在以往的汉学史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汉学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引起的变迁和发展关注得较多，比如说汉学受制于其所在国的思想大势和学术思潮等等。但以《中国评论》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汉学在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甚至远东地区的发展和其所展示出的种种特色，为我们从另一个向度观照汉学的发展史和其具体形态提供了新的思路，那就是地理（或者空间）的变迁也将会对汉学的发展和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十九世纪是西方殖民势力逐步进入并控制远东的时代，同时也是西方汉学研究起步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殖民扩张催生了作为新力量和新形态的“侨居地汉学”，而“侨居地汉学”在作为西方汉学在地理上的扩展的同时，又因其独特的形态反过来为西方汉学提供了新的血液，促进了西方汉学的深层发展。

三、“侨居地汉学”与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之发展

回到篇首关于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的评价这一问题。在全面看待英国汉学尤其是以《中国评论》为代表的“侨居地汉学”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时，这一看似令人迷惑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批评这一时期英国汉学停滞不前的学者限于其学术视野，仅仅考察了英国汉学在其本土的基本情况。而持正面评价态度的学者则是有意或无意地考量了“侨居地汉学”后才做出了自己的论断。他们中或者如吉瑞德教授那样注意到了《中国评论》等期刊；或者所依据的材料比较全面，以阙维民先生为例，他的统计数据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所编的索引[46]。众所周知，高第虽然是法国人，但却对英国汉学有着至为渊博的知识，被誉为“在法国和英国传统之间的一座活着的桥梁”[47]。高第所编纂的《西人论中国书目》，第二版共有5卷、4439页，在收录1924年前西方人汉学研究的著述方面可谓巨细无遗，不仅包括了全部前文所讨论的刊物，还著录了众多其他涉及中国研究的刊物，如西人在朝鲜出版的《朝鲜评论》（Korean Review，1892－1901）[48]等。阙维民先生在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数据，自然包括了英国汉学“本土”与“侨居地”的两翼，故其结论也较为客观。

如此看来，认识和评价《中国评论》及其所代表的“侨居地汉学”倒成了看待十九世纪英国汉学的关键所在了。笔者以为，《中国评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值得注

意的成绩。

1. 文献范围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继承了法国汉学所开创的文献研究法，大量利用中国文献来研究中国。加上该刊的作者大都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住于中国的经历，使得他们在材料利用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突破。如嘉约翰（J. G. Kerr）在《中国评论》上所发表的《广州固有的慈善设施》[49]一文，“在介绍育婴堂等官营设施的时候，他利用了《广东志》（乾隆三年［1738］）来追寻它的历史，而且亲自前往育婴堂、老人堂、普济院进行实地调查，有时还尝试着向设施的管理者提问。同时，他在育婴堂还注意到了建立在那里的石碑，根据碑文记述了育婴堂的经营规章。在介绍爱育善堂实际经营状况的时候，他使用了该善堂发行的同治十一年（1872）和同治十二年（1873）的两册报告书。这无疑就是‘征信录’。他在研究中使用了地方志、碑文以及征信录，而且还进行了实地调查，其研究方法是十分正确的。特别是他在研究中使用了同治十一年（1872）和同治十二年（1873）的征信录。爱育善堂创建于同治十年（1871），同治十一年的征信录是该善堂创建后的第一份年度会计报告书，而这一善堂有被认为是广东省善堂的‘嚆矢’，如果联想到该善堂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1954 年被广州市公益社团联合会接受为止，那么就有必要说明嘉约翰的研究是无比珍贵的。”[50]

此外，《中国评论》的研究还引进了近代西方所发展起来的语言学、语音学、神话学、人类学、历史比较法等学科和研究方法。如艾约瑟（J. Edkins）就认为应该使“葆普（Bopp）和格里木（Grimm）所发明而又经过谬勒教授发展的定律”成为“汉语研究领域的指南”，当然，“应用这些定律需要探讨各种汉语方言、研究语音和字体的演变、比较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追寻同源词并验证词汇起源和变化的法则，此外还有语序问题以及并列词汇的类别和韵律问题。”[51]最重要的是要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比较语法并着重比较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52]。基于此，艾约瑟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二十余篇研究汉语的论文，讨论了汉语的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是汉语同阿卡德语等语言之间的关系。此外，丹尼斯则采用了谬勒教授和格林兄弟“为其后继者所铺就的”[53]比较神话学的方法，对中国和雅利安种族的神话传说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被认为是“一种跨越种族和文化的探索，预示着比较研究的广阔前景。”[54]当然，艾约瑟和丹尼斯的上述研究还完全笼罩在欧洲学术的阴影之下，未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艾约瑟的研究即受到了来自德国的学者福兰阁（O. Franke）的批评，在福兰阁看来，艾约瑟在做汉语比较研究时，不管是死语言，还是活语言，他都能从中找到其与汉语的亲缘关系。福兰阁对此种研究方法颇有批评，他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上发表《中国和比较语言学》（China and Comparative Philology），对这种观点和方法提出了商榷。“据说该刊编辑艾德对于福兰阁加入讨论，澄清真相，表示了热情的欢迎。”[55]尽管如此，艾约瑟等学者引进西方理论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做法，在学术史上还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2. 专业汉学刊物的出现和学术自觉的持续加强。《中国评论》是目前所知“西方世界最早的真正汉学期刊。它们至少是最早完全关注中国的期刊，与此同时它们也自我意识到自己所担当的科学任务。”[56]另外，该刊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学术自觉，即开始批判汉学研究的状况并思考关于汉学的一般问题。1873 年，《中国评论》第 1 卷第 4 期发表了艾德那篇享誉盛名的评论文章——《业余汉学家》。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说，在时下的汉学研究中，可以观察到一股暗流，类似某种慢性或间歇性精神疾病。“这种‘流行病’的主要‘症状’，我们可以称之为‘业余汉学家’。他们热衷于在科学的‘幌子’下依据一些事实建立起无所不包的‘戒律’，这中间充满了臆测和武断，弥漫着他们处理材料时的不分青红皂白，还要加上对原始文献的肤浅解读、无视经典‘微言’的傲慢和批判精神的彻底泯灭。”[57]这样的著作当然毫无学术价值可言。那么汉学应该往何处去呢？怎样才能深入地研究中国呢？艾德认为首先“我们在接触中国文献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未知领域还很广泛，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掌握全部

内容。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取一个分支，进行专门的研究”[58]。更进一步，“我们应该以原始材料为基础，当然也包括诸如注疏、传记和百科全书这样的二手材料，并利用哲学思维历史地、思辨地检验和批评这些材料。不对任何东西想当然，也不依赖于潮流和传统的力量，而是严格地检验那些被称为确凿和古典的事物的真实性，公正地就事论事，就像我们坐在检验法庭的凳子上一样。”[59]

《中国评论》甚至出现了以“汉学是一门科学吗”为题目的讨论文章。作者问道“汉学是一门科学吗？像其他学科一样？还是如‘颅相学’一样建立在臆测的基础上，仍旧是不确定知识的混合体？”[60]这样的问题虽非一篇论文所能解决，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评论》同仁对汉学的深入思考。而作为《中国评论》的后继者，《新中国评论》的自觉性更强，前引库寿龄的话已经表明，其创刊“新评论”就是要为英国汉学争取其应有的地位。

3. 新领域的开拓。以《中国评论》为代表的英国“域外”汉学的成就，还包括该刊对汉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梅辉立（W. F. Mayers）的《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61]一文，本为翻译和考释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一书“自序”至上卷“爪哇国第三”之间的内容，但因其中涉及郑和，且考证详实，遂成为西方郑和研究之始。伯希和在《郑和下西洋考》中叙述学术史时也首举“迈耶斯（Mayers）在《中国杂志》（China Review）第三册（1874－1875 年刊）同第四册（1875－1876 年刊）中之研究”,[62]可见梅辉立在郑和研究上的首倡之功。又该刊所载艾德的《客家历史纲要》和毕安（C. Piton）的《客家源流与历史》[63]是中外学术界关于该领域的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分别利用族谱和口头采访所得到的材料，从移民史的角度对客家的历史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不仅引起国际汉学界对客家研究的重视，还影响到了我国被称为客家研究权威的著名学者罗香林先生[64]。而在艾德和毕安之前西方人关于客家的作品仅有梅辉立对“广东土客大械斗”的记载，很难称得上是研究，所以说《中国评论》的研究可以说是开了国际汉学界该领域研究的先河[65]。

再如艾德的香港史研究，在《中国评论》刊出后不久即由别发洋行出版。作者“见证了许多他所叙述的事件并拥有直接的认知。因为长期居住于香港、作为一名殖民政府官员的他更容易理解所发生的事件。”[66]更为重要的是艾德所利用的一些资料“已经消失了，且可能是永远消失了”，因为“在日本占领香港期间，许多文件和政府通信由于战乱、掠夺、忽视和恶意破坏而化为乌有。”[67]从而使该书成为最早的香港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

以雷慕沙和儒莲为杰出代表的法国汉学学派虽然受制于欧洲图书馆文献资料的限制，但毕竟发展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文献学方法，故而在汉学史上也一度处于领先地位，他们所领衔的“法国汉学学派”时期大约从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开始，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末，这一时期西方汉学界呈现出的是一幅法国汉学独步天下的历史图景。

但是，“英美学派”尤其是英国汉学的崛起打破了前述西方汉学研究的地理格局。“英美学派时期”的汉学家“最初运用了尚且幼稚的考古学、碑铭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学科方法的田野工作刚刚起步。在居住于中国的兼职汉学家们当中，理雅各是最有影响的杰出人物。继儒莲之后成为汉学家中大师级的人物，他在 1876 年坐上了牛津大学汉学研究首席的交椅，由此确立了英美汉学相对于法国汉学的优势地位。”[68]理雅各的主要工作是翻译《中国经典》，所以说他在牛津的位置对于英国汉学来说象征性的意义更大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仅至于此。真正运用韩大伟所说的引进西方学术的新方法从事汉学研究并开始所谓的“田野工作”的，应该说是《中国评论》为代表的“侨居地汉学”。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前文中实际上已经做了足够的交代：艾约瑟的汉语研究以及丹尼斯的中国神话研究属于前一种，而嘉约翰在研究中访问当事人、搜求征信录和利用碑文资料则属于第二类。特别是第二点，可谓《中国评论》这一在中国本土出版的刊物的最独特之处。所以说，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英国汉学的代表应该有两个：理雅各和《中国评论》，他们共同见证了英国汉学“惊

人的一跃”，促使英国汉学对法国汉学实现了暂时性的超越，从而改变了十九世纪末期西方汉学研究的地理格局。

结语

《中国评论》可谓处于中西学术界“辖地的边缘”。在西方学者看来，该刊物出版于中国，且是标准的专门研究中国的期刊；而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其又是来华外国侨民所经营的外文出版物。结果，《中国评论》几乎被历史的尘埃彻底淹没。然而，在全面看待近代英国汉学，尤其是充分考虑英国“侨居地汉学”在远东之发展的新视野下，这些被腌制在幽暗斗室之中且早已泛黄的外文旧籍，瞬间之下显得熠熠生辉，展示着英国汉学“本土”与“域外”的两翼齐飞的地理格局以及英国汉学在近代的整体崛起。理雅各和《中国评论》所代表的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英国汉学在整个西方汉学界的领先地位及其对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格局的影响，足可改变关于英国汉学的固有偏见。

＊本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7C2S019

① 钱钟书：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见《钱钟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83 页。

②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84 页。

③ T. H. Barrett，Singular Listlessness：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London，Well sweep Press，1989。

④ 近藤成一著、王瑞来译：《英国的中国学》，见《汉学研究通讯》，1993 年，第 4 期，247 页。

⑤ 阙维民：《剑桥汉学的形成与发展》，见《汉学研究通讯》，2002 年，第 1 期，33 页。

⑥ 见《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 年出版），119－147 页。

⑦ Introductory，CRNQ，Vol. 1，No. 1（1872）. P. 1.

⑧ M. G. 马森著、杨德山等译：《西方的中华帝国观》（时事出版社，1999），71 页。

⑨ Editorial Announcement，CRNQ，Vol. 22，No. 4（1897）. P. 620。

⑩ Introductory，CRNQ，Vol. 1，No. 1（1872）. P. 1.

⑪笔者对《中日释疑》和《中国评论》的作者群进行了统计，发现两者的骨干作者基本一致，主要有：艾德（Eitel，E，J）、梅辉立（Meyers，W. F）、汉斯（Hance，H. F）、包腊（Bowra，E. C）、费笠士（Phillips，G）等。

⑫ 石田干之助：《欧米に於ける支那の研究》（创元社，昭和十八年），115－116 页。亦可参见 Henri 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P. 2416。

⑬ 因为这段话在《中国报学史》一书的第三章“外报创刊时期”的第一节“外国人报纸”之“英文报纸”的“上海”栏下。

⑭《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4 页。

⑮ 别发洋行是近代西人在华经营的一个重要的出版机构，目前对它的研究还有限，不甚清楚其内部的运作情况。

⑯ Publications Périodiques，T'oung Pao，Serie Ⅱ，Vol. Ⅲ（1902），p346。系笔者按大意译出，或略有误差。

⑰ 贝德士：《西方东方学报论文举要》（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1934），4 页。

⑱ 石田干之助：《欧米に於ける支那の研究》，116 页。另参石田干之助著、唐敬杲译：《欧美关于中国学的诸杂志》，《学术界》，第 1 卷，第 6 期（1943－1944 年），49 页。

⑲ China Review，see Samuel Couling：The Encyclopaedia Sinica，Kelly & Walsh，1917，p102。

⑳ Wong Man Kong：Hong Kong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Ernest John Eitel and the China Review 见《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122 页。

㉑ 何寅、徐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05 页。但该书将《中国文学史》第一版的出版时间误写为 1910 年。

㉒ 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73 页。

㉓ 陈才智：《西文汉学研究期刊一览》，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 ID＝1498，2006 年 1 月 15 日。陈先生对《中国评论》的认识存在的另一处误差在于他把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和创刊于 1872 年的 China Review 看作两个刊物，其实是同一个刊物。

㉔ See CRNQ，Vol. 25，No. 3（1900），p156。

㉕ Bibliographical Note，see H. A Giles：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D. Appleton and Company，1929，p442. 笔者所用是该书的重印本，似乎未加任何改正。

㉖ 该刊起初名为 China Review,1900 年开始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 2001 年将刊名该为 The China Review,仍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刊是以英文为主,半年刊,主要内容涉及关于中国政治、国际关系、社会经济等方面。

㉗ 段怀清:《理雅各 < 中国经典 > 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浙江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95 页的第二个注释。

㉘ Notice to Subscribers, see CRNQ, Vol. 19, No. 6 (1892)。

㉙ China Review, see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p102。

㉚ Nicolas B. Dennys and the Descriptive Dictionary, p5。

㉛ Wong Man Kong: Hong Kong and Sino - 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 Ernest John Eitel and the China Review, p. 127。

㉜ G. B. Endacott, Europe in China, by E. J. Eitel: The Man and the book, se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4 (1957 - 1958), p. 56。

㉝ Editorial Announcement, see CRNQ , Vol. 22, No. 4 (1897). P. 619。

㉞ 黄长著等:《欧洲中国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275 页。

㉟《欧米に於ける支那の研究》,116 页。

㊱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 3, No. 5, (1869). P. 90。

㊲ 参见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 3, No. 5, (1869). P. 90。

㊳ 李欧梵:上海的世界主义,见《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 - 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328 - 329 页。

㊴ CRNQ, Vol. 1, No. 1, (1872). p. 58。

㊵ Introductory, see CRNQ, Vol. 1, No. 1 (1872). P. 1。

㊶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1878 - 5 - 25, p. 483.

㊷68《传统与寻真——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第 7 页。

㊸ 马伯乐著、马利红译《汉学》,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三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 年),53 页。笔者注:这段话中的"于连"一般翻译为"儒莲","莱格"即"理雅各",而"中国古典作品"一般翻译为"中国经典"。

㊹ The phoenix, A monthly Magazine For China, Japan & Eastern Asia, Vol. 1, No. 1. (1870), p. 2.

㊺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1886 - 1 - 4, p. 7。

㊻《剑桥汉学的形成与发展》,见《汉学研究通讯》,32 - 33 页。

㊼ N. J. Girardot ,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144。

㊽ 参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 Empire chinois, P. 2989 - 2999。

㊾ J. G. Kerr, The Native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of Canton, see China Review, Vol. 2 No. 2. (1873) and Vol. 3 No. 2 (1874)。

㊿ 夫马进著,吴跃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6 - 7 页。

51 J. Edkins, Chinese Philology, see China Review, Vol. 1, No. 3. (1872), p. 183. 这段引文中的 Bopp 和 Grimm 指的是著有《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的德国语言学家葆普和著有《德语语法》的语言学家雅各布·格里木。

52 Chinese Philology, p. 183。

53 N. B. Dennys, The Folklore of China, see China Review, Vol. 3, No. 5. (1875), p. 269。

54 周发祥:《西方的中国神话研究》,见《汉学研究·第四集》,中华书局, 2000 年, 171 页。

55 张国刚:《从外教译员到汉学教授——德国汉学家福兰阁传》,见《国际汉学漫步·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849 页。福兰阁的文章发表在《中国评论》1893 年出版的第 20 卷第 5 期。

56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P. 145。

57 E. J. Eitel, Amateur Sinology, see China Review, Vol. 1, No. 4. (1873), p. 1。

58 Amateur Sinology, p. 5。

59 Amateur Sinology, p. 5。

60 J. C. Is Sinology A Science? see China Review, Vol. 2, No. 3. (1873), p. 169。

61 W. F. Mayers, 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Vol. 3, No. 4 and No. 6, (1875); Vol. 4, No. 2 and No. 3 (1875)。

62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 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 2003), 11 页。

63 E. J. Eitel,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see China Review, Vol. 2, No. 3. (1873) and C. Piton,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 see China Review, Vol. 2, No. 4. (1874)。

64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4 页。

65 可参 Bibliotheca sinica :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 Empire chinois, P. 369。

66 67 Introduction, see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